

博物館與文化 第 11 期 頁 47~81 (2016 年 6 月)

Journal of Museum & Culture 11 : 47~81 (June, 2016)

博物館中移民勞工之再現——
以新加坡國家博物館歷史展廳為例

張釋¹

Representing Migrant Laborers
i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Shih Chang

關鍵詞：邊界與認同、展示移民、新加坡國家歷史、新加坡華人移民勞工

Keywords: border and identity, displaying migration, Singapore national history,
Chinese migrant laborers in Singapore

¹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
M.A. Graduate Institute of Museum Studies, Taipei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mail: seattle92001@gmail.com
(投稿日期：2016 年 2 月 28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6 年 5 月 26 日)

摘要

一向強調多元族群與文化的新加坡，在面對移動時代的來臨，其博物館該如何再現移民議題？本研究以新加坡國家博物館之歷史展廳為研究個案，以訪談與展示分析來探討其如何再現早期華人移民勞工，且透過何種移民形象譜寫國家歷史與記憶。研究發現，博物館有意識地將移民底層的歷史融入國家史中，強化遷徙造就了多元文化社會的事實。其援引電影元素，讓早期華人移工與「博物館的聲音」共享發言權，更透過博物館的力量使其戲劇性地被納入我群。然而，研究發現館方「多聲體驗」的設計，卻仍共同編織著「單一敘事」，如延續英國殖民制度的族群分類來治理，進而強化國家一族群間的穩定性；其次，透過移工形象的選擇與刻畫，不論是「刻苦耐勞」或「投身國家建設」，均投射出當今新加坡社會所重視的價值與對其國民之要求與期許。而與華人會館人員的訪談，可發現當今新加坡的認同輪廓中，那複雜游移的主客關係無法以純粹由上而下的方式建構，而需透過地方和國家認同架構的交織，才逐漸變得清楚。

本研究建議，新加坡國家博物館在展示移民的歷史，可進一步引導社會思考今日邊界的建構脈絡；使觀眾體認到多元文化社會建立在他族文化與我群的相會交融，是經歷無數離散、跨界、根植與錯位的結果；並透過讓包含地方化的多元論述進到博物館中，讓移民與國家的故事進而產生多重意義。

Abstract

As the world enters the “era of migration”, how should the museums of Singapore, which focus greatly on its multicultural/ethnic heritage, face issues of migr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History Gallery (NMS) as case study, through methods of exhibition analysis and interviews, discerns how the history and memory of early Chinese migrant laborers are projected; and how the laborers’ images further depict national history.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museum consciously integrated stories of migrant laborers into national history, strengthening today’s multivariate society as results of migration. Citing from film elements, early Chinese migrant laborers are provided with a voice equivalent to the “museum voice”, allowing them to dramatically transform from the other to the self. However, the all-too-perfect multi-voice experience not only in effect co-wove a “single narrative”, such as the continuation of colonial race system to discipline, govern and strengthen nation-ethnic stability; but also uses the laborers’ images to shape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s images of diligence, loyalty, and national devotion all project the value and expectation of modern Singapore society. Further,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hui-kuans’ demonstrated that the delineation of Singapore’s identity cannot be single-handedly built in this cabinet of curiosity, and can only become clear through the process of losing, finding and embedding one’s roots within the complicated local-national, self-other relationship.

On displaying migration history under a multicultural and multi-ethnic society, NMS can direct the public to ponder on the construction of borders, to realize that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is built on the encounter and intermingle of self and other; through letting localized multi-discourse into the museum, giving new meaning to migration and national history.

前言

今日的新加坡有 35% 的外來人口，大量移民的遷入，對社會造成不少衝擊；例如，2012 年 7 月 26 日新加坡國慶日前夕一名婦人在住屋發展局所管轄的組屋窗外掛五星旗造成國民反彈並引起警方關注，而事發前一週，另一名女子也因燒毀新加坡國旗而遭到逮捕²；兩起事件都顯示近年來移民與國民的認同差異。而 2011 年 8 月 8 日一個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家庭抱怨其印度裔的鄰居（新加坡國民）煮咖哩的味道，雙方爭執最後到社區的調解中心解決，更引發國民對於移民的撻伐，甚至認為移民導致本地勞工失業、影響生活品質，卻和國民享有部份共同權利與福利，簡直是「外來垃圾(foreign trash)」³，提醒新加坡政府必須在移民管制、廣納國際人才與公民輿論觀感之間找到平衡，亦代表政府欲形塑的「國家社群邊界」⁴不斷受到挑戰。

面對類似上述事件，倡導多元文化並以移民為立國基礎的新加坡並未袖手旁觀，在文化展演上，近年來的藝文展演中均可見到移民勞工的身影，如 2010 年新加坡藝術節演出《吉隆坡—新加坡貨櫃(Cargo Kuala Lumpur—Singapore)》，用貨櫃車載著觀眾繞行港都，探討「國際遷移」的議題，闡明移民／移工在新加坡的歷史、身分與狀態。而 2013 年的電影《爸媽不在家(ILO ILO)》，以 90 年代末亞洲金融風暴為背景，從一個新加坡家庭和外籍幫傭的互動，延伸出全球化下遷移工作所產生的議題。面對當代移民議題，新加坡的博物館似乎仍在思考如何呈現與回應；然而，面對過去的

² AsiaOne News, 2012. "Police Investigate Woman over China Flag Hung Outside HDB". AsiaOne News. Retrieved on December 29, 2013, from website: <http://news.asiaone.com/News/Latest%2BNews/Singapore/Story/A1Story20120726-361470.html> (瀏覽日期：2014 年 10 月 1 日)。

³ Adam, Shamim, 2011. "Singapore Curry Protest Heats Up Vote with Facebook Campaign". Bloomberg News. Retrieved on December 29, 2013, from website: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1-08-18/singapore-curry-protest-heats-up-vote.html> (瀏覽日期：2013 年 12 月 29 日)。

⁴ 「社群邊界」概念取自 Barth (1969) 對於邊界(boundary)的用法，表示人群在互動過程中，主觀的區分而形成族群團體。而「國家社群」概念則取自於 Carnoy (1984)，指的是以國家概念所形成的公民邊界。

移民，可見其對早期移民史與移民生活物質文化之展示的重視；如新加坡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NMS, 下簡稱國家館)的歷史展廳(History Gallery)透過展示再現了 19 世紀的常民生活記憶與移民襲產。國家的博物館作為官方的機構，被社會賦予高度的可信度，擁有挑選與詮釋歷史的權力，並對於「記憶」與「遺忘」有很大的影響力；除了可強化紀念與記憶，亦可間接合理化歧視與遺忘(Kavanagh, 2000)。因此本文期望從理解、分析新加坡國家博物館的展示是如何處理早期華人移民的歷史、國家試圖透過移工的故事來建構何樣的國家記憶，作為關懷博物館展示如何再現移民勞工的一個起點。

本研究採展覽分析及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本研究採用的展覽分析視展示為一個「有意義的整體」，並將建構「意義」背後的論述及社會與歷史脈絡納入研究分析，可提供豐富且深入的見解，同時輔以論述分析的概念，將展示視為文本來檢視，並分析其論述結構及社會脈絡。此外，本研究亦訪談博物館的策展人與研究員，以認識其在策劃展覽時的展示目的、策展理念與展示手法，並訪談與推動華人文化傳承之會館⁵成員，以認識其對於新加坡華人歷史、移民歷史與國家博物館展示之看法。本研究選擇以有展覽空間的會館為訪談對象，會館展覽多以述說各該社群在中國的根源、文化與傳統及先賢為主，也以發揚社群及廣泛中華文化為主軸，整體方向及目的與新加坡國家博物館所欲傳達的在地化、國家意識有不少差別，可被視為國家與地方對展示歷史的不同想像、對於國家意識走向的多元理解之指標，因此透過與館方及會館方的訪談，期望發現多元立場之豐富觀點與深入見解。

⁵ 會館的設立有分很多種，地緣型、業緣型及以血緣為基礎的宗親會等團體。以地緣型會館來說，以同鄉團結為基礎，除了聯誼之外，亦有互助、自保的功能，在傳統的社會經濟及法制面向均扮演了重要的功能(蕭新煌等，2005:186)。本研究訪問的位於新加坡的四間會館為：岡州會館、大埔(茶陽)會館、澄海會館與顏氏公會。

展示勞工、移民與邊界

在國家認同的敘事建構中，移民和流亡者因跨越了邊界、打破思想和經驗界線(Said, 2000)，使其被統治階級歸類為閹限的、邊緣的、帶有病理特徵(pathological)的主體(Madern, 2004: 155)和觸發危機的中心(object of crisis) (Chavez, 2001: 4; Dahlman, 2002: 499)。因此，對於移民社群而言，能將其祖先的記憶納入博物館便是宣稱他們在這想像的邊界與地域中也佔有一席之地，擁有屬於自己的認同空間。然而，以國家主義的觀點出發，移民不只跨越地理的邊界，擾亂了現行國家歸屬感的概念，也使國家的想像與認同邊界變得模糊、我群與他者的身分和對於國家的理解不斷改變，進而導致媒體和政治語彙長期將移民或外國人塑造成對於本國人的威脅。因此，該如何處理移民社群的故事是當代博物館面臨的重要課題。

而國家的博物館作為官方的機構，被社會賦予高度的可信度與詮釋歷史的權力，對於國人尚對移民／移工觀點未有共識，且處爭議的情況下，該如何去再現游走於邊界的勞動社群？針對博物館中勞動階級議題的呈現，Smith et al. (2011)提醒，在再現與階級有關的文化遺產時，觀眾會想要知道什麼該被保存、以及推廣這項保存是否會影響當地的社區、文化資源與環境，因此在再現相關遺產時，必須要討論階級、經濟與社會不平等的問題，因為揭示不平等才能讓人們知道遺產與相關事件的來龍去脈。Smith et al. (ibid.: 2)亦表示即使館方具有強烈的道義責任，也並不一定能確保遺產詮釋完全無誤，在博物館中常見的兩大錯誤為：一、將好的、美的、古老的事物神聖化，並往往認為物質文化與其所代表的科技進步比生產的社會關係、勞動過程與階級衝突來的重要。二、傾向將探討勞工問題的博物館或遺址視為是保守的、商業化的以及庸俗化的。Davies (1996: 114)亦指出其他常犯的錯誤，包括博物館重視物件勝於物件使用者、呈現一個浪漫化的鄉村生活、將勞動生活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e)、以及不夠重視普通的職業（如：女性在勞動產業的工作與角色）等等。勞動的詮釋不應只停留在解釋物件的使用性或執行工作的過程，應涵蓋許多社會政治層面。

而近年來在西方國家，以移民為主題的博物館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但透過其經驗可知，呈現的手法與內容往往不是那麼容易。例如，澳洲的阿德萊德移民博物館(Migration Museum in Adelaide)在展示來到澳洲的各個族群的經驗、歷史與認同時，面臨的不只是公開與保護私人資訊的問題，也要處理各社群所提供的不同版本的歷史。Szekeres (2007: 238)指出，博物館對移民時常採同情的態度，這樣做或許能得到移民社群的信任，但對其他社群而言，博物館這麼做便會被視為是「充滿左翼思想的地方，以致其應所關注和重視的議題被邊緣化」⁶。此外，Szekeres (ibid.: 243)也認為，為了避免以過度狹隘的方式來詮釋多元文化，博物館必需要關注民族以外的身份，如階級、種族與性別等面向。而在法國，籌備多年的法國國立移民歷史城(Cité nationale de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於2007年10月，法國新移民法上路引發爭議之敏感時刻正式對外開放。該館研究員Noiriel (2007)便表示，處理移民歷史與記憶的博物館，往往因建立移民的負面形象、挑起辯論，而成為具爭議性的空間。其研究提供博物館再現移民史所需注意的面向：首先，展示不應僅焦距在個別移民者身上，而應把重點放在移民的歷史過程，並以更具廣闊的視野去看待。其二，與其鼓勵「使『移民文化』被固定、被具體化的紀念舉措，博物館應該強調移民與宗主國在最初接觸所產生的文化突變(cultural mutations from contact with the host society) (ibid.: 15)。最後，博物館應停止使用將移民刻板印象化的紀念性論述(memorial narratives)，因為這些論述「通常都充滿著需要撫平心靈的受害者以及需要被定罪譴責的加害者，而忽略將移民『當作完整的人』看待(ibid.: 16)」。Noiriel (ibid.)強調，博物館在呈現移民時，不應只以國家—移民如此的關係為基礎，而應以人類的歷史為基礎，併同闡述其正面與負面的意向。

「移民／移工」的展示雖可援引過往再現「弱勢」族群的方式為其提供發聲平台，然從Sutherland (2014)的研究可見，「移民／移工」卻無法與國家

⁶ “For others... the museum was viewed as a ‘lefty’ sort of place and as such, of course, could be relegated to the margins of what is taken seriously” (Szekeres, 2007: 238).

(地理上及意識形態上)脫鉤。Sutherland (ibid.)以德國與加泰羅尼亞的歷史博物館及移民博物館為例，探討不同類型的博物館在不同的歷史與社會脈絡下，再現移民社群的展示內涵與策略，並分析其研究的四間博物館如何形塑國家邊界、運用的觀點與展示內容、以及在強化國家認同與歸屬感之際，如何建立與「他者」的關係。Sutherland (ibid.)首先分析的兩間國家博物館⁷—德國歷史博物館(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DHM)和加泰羅尼亞歷史博物館(Museu d'Història de Catalunya, MHC)，兩間博物館雖然都採取線性歷史的敘事方式，對於移民史的態度卻有很大的差異。德國歷史博物館成立於東西德合併之際，當時急需描繪統一的歷史，以強調統一的德國、德國的自信以及民主主義的勝利；因此當時爲了要建立一個單一民族的敘事，而花較少的篇幅來探討「德國作爲移民國」這樣有爭議的主題之外，德國政府也認爲該社群僅是「客工」，並不斷強調德國並非移民國家。相較之下，加泰羅尼亞因長期有從西班牙境內外的人口移入，加上主要活動場域在地中海，鄰近的海上國家統治該地的時間比陸地鄰國還長；因此加泰羅尼亞歷史博物館將「移民／移入」納入展示主題，除了強調遷移和該地區歷史上的黃金時期之關聯，也榮耀移居的農民與工人對海上貿易和城市繁榮的貢獻。然而，上述兩館雖然都在不同程度上將移民史加入展覽內容，卻都停留在敘述過去的移民，未探討當今的移民歷史與相關社會議題。

相較於國家歷史博物館之展示內容與形式，兩間移民博物館—德國移民中心(Deutsches Auswanderer Haus-Bremerhaven, DAH)和加泰羅尼亞移民史博物館(Museu d'Història de la Immigració de Catalunya, MhiC)—針對移民提供了不同的觀點與面向。德國移民中心透過真人經歷和故事，讓觀眾想像移民的旅程，如以互動展示的方式模擬海關詢問的過程，嘗試連結過去與當代移民，並鼓勵觀眾從移民的角度思考「邊界」。該中心激起了對移民更具包

⁷ 加泰羅尼亞爲西班牙的自治區之一，相對於西班牙的其他區，其文化與語言的發展具一定的自主性，獨立意識也較鮮明。本文所提之加泰羅尼亞歷史博物館以推廣、傳承加泰羅尼亞歷史、文化與傳統，故本研究將其博物館定位爲「國家」博物館。

容性的應對與討論，提出不同的觀點與思維，具有和德國的國家建構意識辯論的潛能。另一方面，加泰羅尼亞移民史博物館的兩個展《El Sevillano》和《Migrar》分別探討歷史上的移民和當代的移民。《El Sevillano》試圖讓觀眾想像移民經歷的火車旅程；而《Migrar》也以旅程為主軸，完整介紹遷移、邊界、抵達和居住四大移民過程，除了呼應加泰羅尼亞歷史博物館將移民描述成其族群歷史的一部份，也將「遷移」描繪成相較於「深根(rootedness)」(Sutherland, *ibid.*: 127)的概念，更接近人類特性核心。德國移民中心與加泰羅尼亞移民史博物館的展示均有歷史性和現代性的特質，且以「旅程」和「跨界」貫穿，強調「移動」的觀點超越國家界線的固定性。Sutherland (*ibid.*)進一步指出，將移民放在敘事中心並強調跨境遷移以及邊界的故事，博物館能為國家認同建構提供與單一線性史觀和強調特定民族歷史不同的視角，打破過往以「長久定居(longue durée)」(Aronsson, 2011: 42; Knell, 2011: 11; Sutherland, 2014: 118)族群為中心的敘事觀點，並承認其他社群對於想像共同體的貢獻，使得人們對於「國家空間」的認知也隨之改變。

新加坡國家博物館雖未設立以新移民或當代移民勞工為主題的常設展，但本研究場域之展示敘述可見一條「移民軸線」隱藏於論述之中，強調其作為移民國的歷史事實，更透過這條隱形的「軸線」來再現其早期華人移民故事的內涵與策略。本研究發現該館在處理早期華人移民的歷史方式，除試圖將「移民底層」的歷史融入國家歷史中，更透過移民的歷史、形象試圖建構符合其需求的國家記憶。

個案介紹：新加坡國家博物館歷史展廳

國家館於 2006 年重新開館前，以族群為主題策劃了不同的特展，其中亦針對華人的各個方言群規劃展示，如：1996《來看來時路—閩風南播》、《客家人：從過客到公民》、2001《椰風海律咖啡香—新加坡海南社群展》以及

2002《新加坡潮州文化展》等；並同時參與規劃以廣東人爲主的牛車水華人原貌館。而 2006 年開幕⁸的國家館爲了能再現常民生活記憶與政治史之外的歷史記憶，於歷史展廳（圖 1）中設計兩條參觀動線：國家史蹟路線(Events Path)與個人經歷路線(Personal Path)。國家史蹟路線以「大時代」的視角，介紹各年代重要的事件與人物，爲傳統政治史的主題；個人經歷路線則以常民生活史、小人物的故事爲主線，介紹常民生活經驗與生命歷程，「兩者除了呈現官方的敘述觀點之外，均有穿插個人的故事與經驗」（宋允文，2013.9.5 訪談），頗有小人物撐起大歷史的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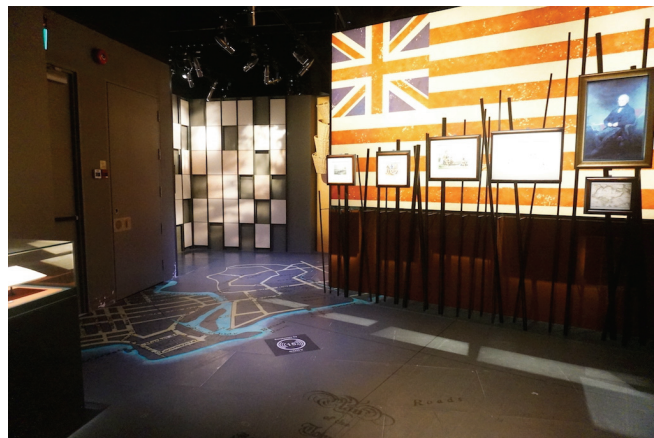


圖 1 歷史展廳 殖民展區入口（攝影／張釋）

新展館的重新開張，代表整個博物館展覽內容與目的的轉變，其中之一便是將其過去所關注的面向從「單一族群」的文化內涵特色，轉爲關注新加坡做爲一個多元文化與族群的「共同體」之發展歷程與生活面貌的演變（吳慶輝，2013.9.6 訪談）。做爲國家文物局底下的單位之一，其任務更是要促

⁸ 國家館 2006 年設計的常設展已於 2015 年重新翻新。

進新加坡的「國民團結」和「身分認同」；因此，除了在展示中承認並強調族群多元性之外，也分別從國家、社會、個人三個層面，透過不同的平台讓國家單位能與民間合作來講述新加坡的歷史（吳慶輝，2013.9.6 訪談）。本研究發現，新加坡的博物館雖然仍在摸索如何處理當代移民史與移民勞工議題，但對早期移民與勞工的再現卻十分重視，因此本研究以此為研究場域，探討新加坡 1819 年開港至 1950 年代之間的移民史的展示內容與手法，並以華人移民勞工為主體，試圖理解博物館如何能用歷史中的移民與族群巧妙地回應尚未觸及的當代的移民議題。以下，將就其所應用的展示手法與展覽內涵進行分析。

多聲的歷史故事？

21 世紀的博物館推陳出新，展示不再僅專注於物件的展示或美學與知識的傳遞，而更強調多重感官體驗，運用新科技讓觀眾擁有獨特的博物館經驗。由於今日的觀眾受虛擬世界和科技產品的影響極大，看待歷史和認識世界的方式也與過往不同，博物館也必須用新的展示方式擷獲觀眾的好奇心。而歷史展廳嘗試利用「新媒體」、從過去以物件為導向的展覽轉而趨近以概念為導向的展覽(concept exhibition)、建立故事性豐富的主軸，以吸引觀眾去認識屬於自己的歷史；其遊走在「物件與概念光譜」(Dean, 1996)之間，尋找新可能性，一再發掘自身優勢並尋求突破。

國家館館員表示，2006 年設立歷史展廳時，爲了要讓歷史變得更貼近大眾的生活，變得更有生命力、更親近、更富有情感，採取了「說故事」的敘事手法；透過多媒體的技術和兩條敘事線的設計，同等強調市井小民和歷史偉人的故事，並以電影的概念來策展。宋允文研究員在受訪時也提到，在策劃歷史展廳的初期，就有希望以電影場景的方式呈現的規劃，「所以在參觀時可以想像是在電影場景。一定會有一個電影場景、主角、事情發展的起源和高潮，就像電影的分鏡場景」(宋允文，2013.9.5 訪談)。策展團隊也選擇了明顯的、接近好萊塢式的電影性(filmic sensibility)展示手法貫穿整個展

廳，為述說新加坡的歷史添加了不少戲劇性的成份(Frost, 2009)。電影作為一種大眾娛樂的媒介，影響現代社會大眾記憶的型構方式，其敘事結構也和其他藝術與媒介不同；以電影和戲劇的元素帶出歷史故事，除了刻意將展廳設計為拍攝場景的樣貌（圖 2），展覽內容也分很多層次，有如電影透過鏡頭遠近來呈現各種的訊息與觀看視角。語音導覽的內容，也盡量透過不同角色在不同情境的對話，呈現底層小人物的聲音，如：說書人說書、記者訪問、官員之間討論、勞動者之間的對話等等；殖民展區劃分成好幾個小區，每一區有不同的旁白、觀點、故事主線，部分亦會邀請觀眾參與，讓觀眾有神入歷史與參與演出的感覺。



圖 2 殖民展區展場（攝影／張釋）

一、多選擇的觀看視角

國家館館員表示，從過去「由上而下(top-down)」的知識傳遞方式，轉為重視多元詮釋觀點，歷史展廳希望觀眾可以認知到歷史不是只有一個或兩個敘事觀點，而是由眾多觀點所組成的，而展覽內容選擇有如電影透過鏡頭遠近的方式，更賦予展示物件與歷史人物不同的意義。藉由將參觀方式如鏡

頭遠近般分層，如自行參觀、由導覽員導讀或使用語音導覽機，觀眾能得到不同深淺程度的歷史故事；而語音導覽機的內容也做分層，能進一步根據觀眾的需求與興趣來提供不同程度的敘事內容；觀眾彷彿成為以自行調整使用遠景鏡頭、中景鏡頭或是特寫鏡頭與角度的導演。吳慶輝助理研究員（2013.9.6 訪談）進一步解釋：「再一個層次就是你去按（語音導覽機），看更多的文物，還有這個四個號碼的...現在這邊（最簡略的介紹）就是大歷史，講大環境，所以他們叫 zoom out」，更細部的探究某物件則稱為 zoom in。採用電影鏡頭的特性，讓觀眾得以「閱讀」導演（策展人）的創作意識，同時也被賦予導演的功能與身份，將自己一部份的意識透過該的技術表達出來，呈現在自己所選擇與創造的歷史故事。

多媒體語音導覽的設計提供觀眾更多層次的內容，並豐富其歷史視角。語音導覽中所呈現的腳本內容，藉由旁白以及設定角色（歷史中人物）的對話，以「第二人稱」稱呼觀眾，讓其有穿越時空、一同參與演出的感覺。例如個人經歷路線的〔導覽 26-余有進〕將觀眾當作是殖民時期的苦力：

男旁白：「在烈日下午辛苦工作一整天後，你來到船舶碼頭休息，聽說書人說故事，今天講的是余有進的故事。」

說書人：「來啊～快來聽我講故事！今天講的是余有進的故事……人們稱他為甘蜜大王！你不知道什麼是甘蜜？你一定是新來的！……讓我來告訴你……」

搭配在船舶碼頭的鐘聲、叫賣聲以及人群熙來熙往的吵雜聲，彷彿可以看見說書人豐富的肢體語言，以及其他聽眾專注的神情。同時因自己（觀眾）扮演苦力的角色，也能透過這故事片段「體會」當時苦力的日常娛樂。

另外，在〔導覽 36-鴉片〕中，觀眾被邀請一同參觀鴉片館，和「演出」的女記者之角色融為一體：

男旁白：許多中國人染上毒癮，其微薄的收入都花在吸食鴉片。我們現在要和一名來自美國的女記者進到鴉片館一探究竟，切記要跟著導遊的指示(remember to follow the guide's instruction)。

觀眾在被賦予觀者和導演的身份之餘，又多了「演員」的角色與身份，讓其在「觀看」與「演出」的同時，思考展覽創作意識所呈現之不同歷史人物，並在認識與審視的過程中去尋找自我。歷史展廳的別出心裁正在於此：透過「故事形式(story-telling)」的展覽敘事手法，呈現非傳統史學重視的掌權者之史料辯證，以輕鬆的方式帶出不同社會階層與社群的觀點，企圖親近觀眾，讓其認知到歷史並非大眾習以為常的時空堆疊，而是經由不斷詮釋而來的；同時也加深了觀眾對於新加坡移民勞工的印象。

二、單一敘事的假象

歷史展廳利用電影場景與電影鏡頭遠近的手法與特性，呈現殖民時期豐富且複雜的歷史故事，透過「多角色觀點」的敘事方式，在每一場景(展區的各小子題)讓角色以第一人稱去講述自己的故事，與促使自己南移的「新加坡夢」，更運用「角色扮演」的策略讓觀眾有身歷其境的感受。藉由觀看和扮演不同角色，觀眾得以進入多個記憶與故事空間，聆聽並感受歷史洪流下的生命經驗與時代精神。

然而，經觀察與分析發現，館方嘗試讓觀眾透過不同的動線與脈絡拼湊歷史事件的多元詮釋觀點，並給底層與個人發聲的機會，如此「多聲體驗」的設計，卻共同編織、支撐著一個「單一敘事」。殖民展區的主要敘事結構，未脫離殖民者作為「主體」之觀點，如展廳中未提及清朝政府對於在殖民地華人所扮演的角色(如：晚清駐新加坡領事館)、或人民因統治者政策引發的各種衝突(如：1876年的郵政局騷亂事件、1897年的人力車主與車夫罷工事件)，也再度顯示其認同英國對於新加坡擁有「不被質疑」的「統治權力」。又如，不論是方言群的隱形或是四大族群(CIMO)的確立，均可見國家仍沿用殖民時期之分類，藉由國家制度來確定、規訓與治理，進而強化國家

一族群間的「穩定性」，無形中以「穩定」、「秩序」注入「新加坡認同價值」。

從展示中的移民勞工形象，發現歷史展廳透過國家史蹟路線與個人經歷路線的不斷交錯與匯合，將移民史巧妙地編織在國家史與個人故事中；除了彌補片面歷史所造成的刻板印象，也透過移民底層的生活與生命故事，讓觀眾可以更親近歷史。然而，館方選擇再現的移民勞工為肯定勞動、強調家庭、勤奮與重視團結的形象，無形中置入了國家認同之價值：符合李光耀前總理大力推動的社會秩序，亦符合新加坡相信亞洲價值與東方精神能帶來的社會繁榮、秩序與穩定(Tamney, 1996)。展示藉由早期移民勞工歷史與形象的塑造，投射出當今新加坡的社會所重視的價值以及對其國民之要求與期許。

移動與移民形象

新加坡特殊的歷史脈絡使得各種框架與人群邊界不斷互動與形塑，而或許因其明瞭國家是由流動的生命個體所組成，便於 1980 年代起積極面對國家文化建構之課題，以國家為主體去建構各種想像的社群與認同。新加坡如何看待移民的歷史、形象，並將「移民底層」的歷史融入國家歷史中，是本節分析的重點。

一、游移時代

國家館未曾以「移民」或是「移動」為主題來設計常設展，但藉由與館方人員訪談得知，其對於移民議題並非不重視，而是將移民的故事與國家的歷史編織在一起，展廳中寧陽會館的大鐘、秘密會社與華人護衛司、以及天后宮的建造等等，既是華人移民的歷史也是新加坡的歷史。

宋允文研究員（2013.9.5 訪談）表示要如何展示出「移動」的概念非常值得討論，除了要先理解文物背後的故事和移民的關聯性外，如何透過「固定」的展覽去呈現「移動的過程」也具挑戰性，1950 年代之後的展區，目前用口述史記錄、護照、個人物品以及語音導覽的腳本等方式，嘗試間接將

「移動」的歷史具象化。而殖民展區的移民過程與意向之具象化並非透過常見的「行李箱」做代表；不論是「個人經歷路線」或是「國家史蹟路線」均以油畫繪製的船隻來呈現。Berger（吳莉君譯，2010：106）認為：

油畫的獨特之處在於它能表現出物件的觸感、肌理、光澤和硬度。就好像你可以用手觸摸那般真實。雖然畫中的影像是平面的，但潛藏其中的幻覺效果卻比雕刻更為逼真。

油畫的繪畫形式所製造出的逼真感，獲得統治階級與資本階級的青睞，顯示「油畫之於表象，就像資本之於社會的關係。它一視同仁的態度將所有事物都變成物品」（ibid.: 104），製造出擁有一幅油畫就代表能擁有畫中物品的象徵，如：靜物畫象徵擁有畫中的商品、動物畫象徵主人的社經地位，而風景畫則將周遭所見視為財產。「個人經歷路線」以英國作家 George Earl 旅行南洋的所見所聞開啓故事軸線，展示的繪畫中多見船隻、港口、以及各族群工作與生活的場景（圖3）。語音導覽〔編號25〕破題便提到：「油畫形塑了西方人對於南洋的想像與印象」，接續為主角 George Earl 描述自己在新加坡港的經驗與見聞：中國人多當技工，印度人的工作則有擠/販售牛奶以及洗衣工等。而在「國家史蹟路線」中，油畫中各類船隻，除了象徵新加坡在十九世紀作為一個自由貿易港的重要據點，亦代表西方殖民者將此貿易站視為己有。以油畫來呈現移動的意向，讓觀眾僅能透過「中產階級」殖民者的觀點去理解開港的面貌，底層移動者淪為整個敘事脈絡的「客體」。透過油畫，殖民者的觀點便如此的被表達出來，和以語音導覽呈現的底層被殖民者觀點相互對照。透過與館方人員的對談可了解，在許多底層故事都沒有實體文獻與物件的情況下，其仍嘗試以相對「抽象」的方式呈現底層的聲音。

館方人員表示，歷史展廳係以新加坡建國論述為論述基礎，雖體認也承認移民與新加坡的關係，但並非展覽重點。而對於博物館未特別著重再現「移民」或「移動」的經驗，亦可以王賡武（2005）之研究作為解釋：其認為對華人來說，「移民」不是移動到他地去生活如此中性的字眼，而經常是因為災難或是經濟因素迫使人們放棄家鄉。「移民」對於中國人來說是痛苦的、

不得已的、不被認同的，也經常是人們不願意提起的經驗。歷史展廳將移民史放在具整體性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中去再現，而非以移民作為一個展覽主題，使移民成為國家史的一環。然而，透過油畫與語音導覽中的對話，雖強化了個人故事與多元觀點，但整體而言卻仍以殖民者所建構的社會為述說歷史的架構，忽略了其他不同的政治與民間力量的歷史痕跡。同時，國家所強調多元文化與多元族群雖適當展現於博物館之中，卻未凸顯其之所以能以多元文化與多元族群立國，先決條件便是在這兩世紀（甚至更久）的移動過程的發生。



圖3 George Earl 繪製的南洋景觀（攝影／張釋）

二、移民形象

Chavez (2001) 分析美國 *Time*、*Nations* 等國內雜誌封面的移民形象，並將其發現歸納為三類⁹：肯定的形象(affirmative)、警示的形象(alarmist)以及中立的形象(neutral)；其中肯定的形象以三種主題與目的出現為最高比

⁹ 肯定的形象將移民與國家的建立做連結（例如，表示美國是由移民構成的國家）或是透過痛苦的影像來博取同情。警示的形象則將移民與社會問題、國家分裂、危機等關鍵字做相連，顯示移民對國家造成的威脅與恐慌。中立的形象則表示影像所傳遞的訊息並沒有明顯肯定或是警示的意謂 (Chavez, 2001: 21-22)。

例：「國家／國慶」顯示移民與國家的正面關係、「家庭」顯示以家庭為單位融入新社會建立新根源、「種族／族群」展現國家的包容性及成員的多元性、及「女性—小孩」欲博取國人的同情心與協助。而警示與中立的形象則可以「水災」代表移民人口多到難以控制、以及「邊界」代表著移民仍為「外人 (outsider)」或代表移民嚮往的新世界（要越過邊界的美國夢）出現的比例最高。若以 Chavez 的分析與歸納法則檢視博物館展示所傳達的訊息，可發現殖民展區的華人移民勞工，多為肯定形象，除了族群性較鮮明之外，則多以「艱辛」、「隻身」、「疾病」、「困苦」等形象呈現，並以「思鄉」、「械鬥」、「勞動」、「階級」等主題為背景（表 1）。

表 1 國家館歷史展廳殖民展區中的華人移民勞工的形象與主題

	身份/職業	形象	主題
女性	媽姐	艱辛、隻身	勞動、思鄉
	娼妓（日本）*	艱辛、困苦、隻身、疾病	勞動、情感
	紅頭巾* ¹⁰	--未出現--	--未出現--
男性	人力車夫	艱辛、困苦、疾病	勞動、社群
	歐洲家庭僕人	艱辛	勞動、階級
	私會黨成員	艱辛	社群、階級、械鬥
	苦力（陳篤生區）	艱辛、隻身	勞動、社群、思鄉
	苦力（林文慶區）	困苦、疾病	階級
	苦力（鴉片區）	困苦、疾病	階級
	苦力（船港區）	艱辛	勞動、階級

（製表／張釋）

由上表歸納可知，「艱辛」與「困苦」的形象普遍顯現於華人移民勞工身上，與前述王賡武（2005）研究指出華人對於移民的觀點相似。東南亞殖民地為歐洲各國帶來新的世界觀，殖民經濟也為其帶來許多商業利益與物質繁盛(Trocki, 2002)；然而，歐洲人為東南亞帶來了資本主義經濟，將東南亞拉入世界經濟的一環，造就了過去不曾存在的中產階級與資本階級，卻也擴大了社會階層的差距。在〔導覽 30-Poor Lives〕中，旁白如此地描述：「這

¹⁰ 國家館歷史展廳未呈現紅頭巾的身影，而在牛車水華人原貌館則有對該社群的大幅介紹，在此標出以作比較。

是兩個城市的故事...在蓬勃發展的國際港口，富人獲利、窮人努力求生存、社會問題越來越多」。又如〔導覽 35-人力車夫〕，透過旁白以「富人越富，而窮者仍和營養不良與疾病奮鬥(The rich lift it up, while the poor struggle with malnutrition and disease)」描述當時的工作環境之外，亦藉「生活充滿恐懼與緊張，但仍可見希望(Life was a growling strain, but there is still hope)」開啓故事，由兩名苦力的對話，道出當時的生活樣貌以及在遠離家鄉後所培養的弟兄情感：

一名苦力來到新加坡後，在同鄉的幫助下獲得人力車夫的工作，在路上巧遇過去曾經幫助他的兄弟，見其窮困潦倒、被粗重的工作弄得身心俱疲，便免費載他一程。途中經過正在工作的媽姐(Cantonese maid)、妓女院、以及苦力欠債許久的鴉片館，便加速駛離；最後則在轉彎時出車禍作結尾。（研究者描述對話內容）

簡短的對話同時呈現了華人會館的功能、男女性的不同勞動職業、底層生活的艱辛、四大惡習、以及工作的危險與缺乏保障。在殖民展區「國家史蹟路線」與「個人經歷路線」交錯之處，一邊呈現的是正式知識與權力所認可的「大傳統(Great Tradition)」，記錄著主流、上層的生活與思想；另一邊則透過「小傳統(Little Tradition)」的觀點來呈現移民底層生活與生命故事。而進一步分析則可發現，館方選擇再現的移民勞工為肯定勞動、強調家庭、勤奮與重視團結的形象，符合李光耀前總理大力推動的社會秩序，亦可對照新加坡政府一向視家庭為國家結構之重要核心，並透過社會福利制度來加強國人的家庭觀念，期望「通過儒家倫理文明加強本國的家庭倫理美德教育，使得國人和睦，社會穩定」¹¹。

¹¹ 新加坡文獻館，2006。新加坡政府對儒家倫理家庭美德建設的探悉：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09>（瀏覽日期：2014.11.29）。

展示游移時代的人群圖像：族群、性別與職業

萊佛士開埠初期，吸引大量來自檳城與馬六甲等地的華人，直到 1840 年代才逐漸趨緩；取而代之的，則是來自中國以福建和廣東兩省為主，包括五大方言群的移民。總體人口數而言，華人於 1836 年已佔新加坡總人口的 46%；到了 1840 年更是超越了總人口數的一半（李威宜，1999：46-47）；1900 年後，華人占新加坡總人口數的 70%；而 1930 年後女性移民人口數也首次超越男性；除此之外，移民也從短期居住轉向長期定居。

華人男性移民形塑了新加坡的勞動人口，他們參與開拓與建設，並從事農業（種植甘密）、服務業（運輸和叫賣）與搬運（採礦）等工作。而女性移民，於 1819 年開港的前四十年，其比例在華人總人口數僅占不到 10%，大多伴隨家人而來或從事娼妓工作；1930 年後女性移民人口增加到 30% 以上¹²，1946 年更是達到了 46.8%，當時有部份女性成爲了從事家務勞動的媽姐或是在建築工地工作的紅頭巾（Dobbs, 2003: 138）。新加坡國家博物館歷史展廳中可見早期華人移民之職業再現之多元廣泛，如船工、媽姐、娼妓、人力車夫等，亦可見到各行各業所對應之社群，試圖強化新加坡以多元文化與族群社會立身之新興國家之特性。本章將從展覽中的族群分類、及華人移民所從事之行業與性別之議題，分兩部分進行分析。

一、共處一室：延續殖民統治之族群分類

雖然新加坡強調其多元族群的豐富文化，但展覽不以族群作爲主題區分，而是以概括的方式介紹不同社群在這片土地的歷史洪流中所扮演的角色¹³。研究發現，展覽中的族群比例與當今的族群比相符，但作爲華人社群鮮明的「方言」社群卻隱沒於展示論述當中。吳慶輝助理研究員（2013.9.6 訪

¹² 「1930 年代因經濟不景氣而開始限制中國男性移入的人口，導致中國女性前往新加坡工作的人數在這一段時間極速遽增」（Topley, 1959: 213）。

¹³ 國家館自 2006 年重新開館後不以族群爲展示主題，而以國家歷史與個人故事爲主軸，並按時間序交錯闡述（詳本文第三節、個案介紹）。

談)表示在設計展覽內容時,族群比例並非依照國家目前的族群比例而定,展覽「是按主要的歷史事件與時間」來呈現,每一事件則由不同的社群構成,並作為主要敘事者。以 McGregor (2004)研究印度尼西亞國立博物館的轉變為例,其表示展示族群的多元性是殖民者展現自己對於殖民地有絕對政治與文化控制權的自信與驕傲,而印度尼西亞國立博物館依然使用殖民時期的族群分類做展示主題,顯示其對於國家「多元性統一(unity in diversity)」的想像仍受制於殖民者所建構的想像認同。新加坡國家館以概括的方式去呈現新加坡歷史,除了能避免在展廳中造成族群與不同文化的「階層分級(hierarchy of classification)」之外,亦能避免毫無意識地將不同的族群刻板印象化,這同時也是博物館嘗試去殖民化並建立新認同的依據。

然而,其族群分類沿用英國殖民時期的四大族群分類為基礎,未進一步去細分各族群中的不同社群(如華人的方言群分類或是印度社群內部的階級分類等),卻可被視為為英國殖民統治基礎的延伸。Rocha (2011)指出族群分類也在英國殖民統治的過程中逐漸減少(1881年有47種分類,當今只剩四種:CMIO¹⁴),而其研究爬梳新加坡從殖民時期至今的族群分類演變,指出英國殖民者透過地區劃分,實行種族隔離的政策,導致「族群間能有互動、但無法交融(for they mix, but do not combine)」(Furnivall, 1948: 304; Rocha, 2011: 98)。Rocha (ibid.)也引用 Goh 的論點指出,因族群「先天體質」的差異僅能透過殖民體制來管理並確保其穩定性,如此的族群多元性強化了殖民者的統治權力,並接續引用 Barr and Skrbis (引自 Rocha, ibid.: 103)的論點,表示:

接續了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分類方式,新上任的李光耀總理與其內閣將多元種族架構發展成理性的、可管理的人口分類形式,並在多元種族的國家內部整併種族身份。

¹⁴ Chinese, Malay, Indian and Other(CMIO): 各自獨立但平等的族群構成獨特、引人注目的新加坡認同(Chan, 2009; Hill and Lian, 1995; Siddique, 1989; Rocha, 2011: 104)。

由此可見博物館的族群分類是國家族群政策的寫照之一。對此，澄海會館的吳先生與陳先生（2015.6.25 訪談），以及新加坡客家茶楊（大埔）會館的何先生均（2014.6.26 訪談）認為博物館是考量要維持四大族群間的和諧，若太明顯彰顯華人的文化或歷史，可能會造成其他族群的不平衡。其認知與觀點符合 Chua (2003: 60-61)的論點，指出新加坡透過承認其為「憲法上多元種族國家」的概念，並使之成為「治理工具」，在 CMIO 如此的分類下，每一位新加坡公民都是「複姓公民(hyphenated citizen)」，他表示：

種族的分化使得國家必須建立在族群之上，作為中立的裁判，負責監督和維護族群間的和平與平等。該立場使得國家能免於受多數華人所主導，從而達到高的自治水平，並和單一族群利益保持距離。

研究者訪問的四間會館¹⁵人員表示，雖然近年來政府較過去重視會館的歷史與功能，國家文物局亦透過協助會館自辦展覽、節慶活動，或聯合舉辦新加坡遺產節(Singapore Heritage Fest)，讓民間文化能藉由多元的管道發揚、傳承，但「博物館對於各方言群，甚至印度或馬來人的不同社群之歷史應有更深入的探討」（何先生，2014.6.26 訪談）。

新加坡的方言群，根據 2000 年的人口統計（以個人認同為辨認標準），可分為福建、廣州、客家、潮州、海南等五大傳統方言群；廣西、福州、興華、福清等四個次級方言群，以及其他各小方言群（文平強，2007: 27-35）。歷史展廳中的各人物的故事並未明顯提及其所屬的方言群或是否為海峽華人的身份。而根據麥留芳（1985: 67）所示，早期華人移民之職業類別往往可用原鄉地域與方言群來區分，而在博物館中，雖然方言群乍看之下不明顯，但細看便會發現館方有意識的選擇涵蓋多種華人方言群之職業別來呈現殖民時期的常民生活樣貌（如：種植甘密—潮州、媽祖—廣東、天后宮—福建）。另外，不同方言群的身份雖然並沒有透過展板文字顯示，卻藉由語音導覽的角色對話傳達出來，例如：在開頭會先講一段該職業、角色所用的方

¹⁵ 本研究訪問的位於新加坡的四間會館為：岡州會館、大埔（茶陽）會館、澄海會館與顏氏公會。

言，再切換成觀眾所選擇的語言（英文、中文等）；除此之外，也會在背景聲音中插入不同的方言。如〔導覽 36-鴉片〕之結尾，則是由吸食鴉片客在煙霧瀰漫的房間中，以客家話說起了與家人團圓的夢話。除了在對話背景中加入少許的方言之外，部分口述記錄如〔導覽 47-II 媽姐〕透過兩位廣東婦女的口述來介紹日常工作內容與「梳起」的儀式和過程，在口述開始播放時，觀眾可聽到受訪媽姐以廣東話、原音重現，過幾秒後才會以觀眾在語音導覽上所選的語言之翻譯蓋過方言的音量。研究者認為館方選擇不鮮明展示華人方言群的解釋之一為：華人由多個方言群所組成，他們唯一共通點則為書寫的語言。國家因此將方言從各公共廣播媒體中去除，期望透過「華語」以團結「華人」，方言在歷史的進程中，因為錯誤的認知與假設，以及「團結族群的方便性」而受到較少的重視(Chua, 2009)。

從方言群的隱形以及四大族群的確立，可見國家仍沿用殖民時期之分類，將多元且分裂的族群與文化認同，透過國家制度的確立得以規訓與治理，進而強化國家一族群間的穩定性。而會館方對於博物館沒有詳細述說各族群根源的歷史之觀點，顯示博物館尚未透過展示處理同一族群之間的認同差異以及離散認同之混雜，各方對認同之不同對話並未顯示於展覽之中。然而博物館透過讓族群和社群分類隱藏在展示內容及語音導覽之中，以避免簡化族群的努力仍值得肯定。針對不同族群間的互動，雖然英國殖民者執行種族分離政策，降低相互交融的機會，然而族群認同的產生與強化，乃透過與其他族群之互動與主動形塑文化認同、建立邊界而成(Barth, 1969)，因此殖民地也應可見不同族群生活與互動之特殊景象。在國家史蹟路線可見殖民時期繪製的油畫，記載當時的人物與景觀，有一幅呈現不同族群與身份階級的社群之共處：該畫為John Turnbull Thomson於1851年所繪製的《The Padang in Singapore》(圖4)；畫中可見不同族群與階級的人同處於一片青草，享受休閒生活，有上身赤裸的印度人、梳著辮子的華人、騎著馬的歐洲人等等，呈現19世紀新加坡的族群多元性與階級區分；但畫中族群仍未見不同族群較明顯的互動。然而，油畫本身就可謂族群與階級互動的代表之一：像是殖民時期許多中國畫家會為歐洲中產階級繪製人像，或是單純將自己所繪製的風景

圖，透過為仲介的海峽華人賣給嚮往東南亞風情的歐洲人，如殖民展廳中的珊頓·湯姆士爵士(Sir Shenton Whitelegge Thomas)的肖像便是出自於徐悲鴻之手。

國家館亦透過語音導覽內容的設計，呈現殖民時期多元族群相遇的過程，以及西方統治階級與華人勞動階級在社經地位的差異，彌補歷史物件無法展現的互動關係。其中如〔導覽 35-Mems〕(圖 5)藉由歐洲女主人與僕人(華人)的對話與口白，呈現跨族群且跨階級的互動關係(觀眾也被賦予演員的角色，化為僕人的傾訴對象)：

女主人講著一口怪腔怪調的中國方言命令著，僕役們一聽到女主人的聲音除了感到害怕，也對西方人自以為標準的中國方言感到不受尊重。女主人整天嚷嚷著「小子(Boy)」、「豬尾把(Chinese Pig tale)」，還高傲地說「不用出門便可以靠中國僕人完成所有的事情」，要其女同伴們也多利用僕人，「讓他們有事情可以作(give them something to do)」。最後以女主人大喊：「Here boy!」，以及僕人無奈的說「她又要我們做什麼了啦(What does she want now!)」作結尾。(研究者描述對話內容)



圖 4 《The Padang in Singapore》
(攝影／張釋)



圖 5 Mems
(攝影／張釋)

二、南洋新生活：職業與性別

「早期華人勞工，胼手胝足，推動了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是無數的幕後英雄」（崔貴強，1994：125）。國家館館方表示，殖民展區的「個人經歷路線」以事件為單位；事件的中心則多圍繞「勞動者（移民勞工）」的日常，而館方也選入了具時代代表性的幾個職業；其中，女性勞動者的呈現也十分值得注意。以下分別闡述勞動職業與女性勞動者的挑選與呈現。

首先，博物館所再現的歷史，均是經過篩選而來，而如何挑選歷史事件、敘事觀點及象徵性的載物，以符合國家對於多元觀點的要求，則一直是博物館最大的挑戰。國家館館方表示，歷史展廳中的歷史人物之選擇，除了以多種具有時代特性的職業別來重現時代氛圍，性別亦在選擇角色時被納入考量，賦予過去較趨近完整的生活場景。館方研究員表示，人物的選擇受其時代特性以及文獻資料的豐富度影響；殖民時期的文獻資料多出自於英國殖民者或是從歐洲來遊歷的作家、記者等等，而關於底層的歷史記錄十分罕見，尤其勞動階層也鮮少會透過文字來記錄自己的生活，為設計展覽內容添加困難度。除了媽姐的錄音是經口述訪談得來的一手資料之外，關於其他勞工的資料均為二手資料，如：人力車夫、苦力、妓女等底層勞動者的展示論述來自於 James Francis Warren (2003) 的《Rickshaw Pullers》一書與研究資料；可見館方依據有限的資料而影響其所能選擇呈現的職業類別。

其次，針對展示中女性勞動者身影的呈現，Smith (1994) 指出，在傳統的博物館展示中，女性經常被放在固定幾個領域，例如服飾、家庭或養育兒女的場合等；女性的活動則時常被視為是輔助男性／主流敘事的，而忽視了其有複雜、多元的面向 (Porter, 1991)。相對上述慣常展示女性的刻板印象，殖民展區呈現不同於傳統的女性形象，塑造另一種「勞動女性」的價值，而由於 19 世紀的華人移民以男性為多數，一直到 1853 年的人口統計資料才開始出現女性，但也占很小的比例（1888 年，女性佔全部移民人口的 1.9%，1898 年則佔 4.6%）；要進入 20 世紀初期，女性移民的人數才有快速的成長（崔貴強，1994：21-22），女性在展廳中也因此集中在 1900-1940 年代（殖

民展區與現代展區的交接處) (圖 6)。

殖民展區特別展示勞動的而非在家中的女性，顛覆過往在博物館中女性的缺席或居家化，挑戰了「男主外、女主內」的思考模式，觀眾也因此能聽見過去一直被忽略的聲音。研究者訪談的其中兩位館員針對展示女性各自提出不同的看法：吳慶輝助理研究員 (2013.9.6 訪談) 表示展覽應該要平衡性別的比例，並留意過去沒有聲音的社群，包括婦女和其他弱勢團體，而這也是 90 年代以來的展示趨勢。而高級研究員 Chung May Khuen (2013.9.4 訪談) 則認為博物館不用特別展示女性的貢獻，因為是「歷史就是歷史(history is history)，女性對社會有很大的貢獻是事實，因此也自然而然會有一個部份展示女性的歷史」。其中，展示特別呈現媽姐與娼妓等較具時代指標性的女性底層勞工：

(一) 媽姐¹⁶

媽姐的展區落在 Modern Times 主題區中，透過一個小角落的小房間，以隱晦(suggestive)的手法、藉由日常用品、服飾、簡易的個人房間等 (圖 7)，搭配口述史的錄音來呈現。展覽中除了呈現媽姐「勞動者」的身份，亦透過簡易的房間代表其勞動者以外的身份，並透過語音導覽闡述工作內容與下班生活，如〔導覽 47-II 媽姐〕：

廣東婦女 1：「我為一個歐亞混血的家庭工作，每天從 6:00 開始工作一直到晚上 8:00 才結束…工作很簡單。回到苦力待的小房間後，大家會聊天…那些是美好的時光。我們也會寄信回家……希望有一天能回到中國。」

¹⁶ 媽姐又稱「自梳女」，為清末來自中國廣東順德的特殊群體，當地的未婚女子會將頭髮梳成辮子，並挽成簪，表示終身不嫁、獨身終老。丘婉鳴 (2005: 43) 據《順德縣誌》記載指出，「當時順德蠶業發達，許多女工收入可觀、經濟獨立」，又當時婦女結婚後在婆家地位低微，自梳女寧靠自己賺錢也不願受束縛出嫁，因此選擇終身不嫁。1930 年代，順德的絲綢業式微，加上日本侵略中國而導致民不聊生、經濟凋敝，當地人開始離鄉出外謀生，自梳女也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踏上離鄉的旅程；為了養家與維持生計，有些自梳女便來到香港、馬來西亞或新加坡當家庭女傭，也被當地居民稱為「媽姐」。

上述例子展現女性作為勞動者的一環，同時藉由介紹梳起儀式與結拜姐妹情感，賦予媽姐獨立、堅強女性的意向：

廣東婦女 2：「隻身來到南洋……在這，姐妹們會互相照應。」

館方有意識地在兩個時代的交接處為女性做一個專區，希望能展示女性對社會現代化的貢獻，並顯示在這一區塊的女性勞工所展現的是一種新式家庭的出現，突破傳統中國社會對於家庭結構的認知、亦突破女性在傳統社會中的定位。



圖 6 女性展區
(攝影/張釋)



圖 7 媽姐服飾
(攝影/張釋)

(二) 娼妓

將時間往回推，在以“Karayuki San (日籍娼妓)”為主題的展區，可見黑暗歷史中的女性職業代表。博物館透過一個幽暗的空間，展示了日本妓女在新加坡的生活與心聲(圖 8)。由於博物館缺乏口述歷史記錄以及相關的文物，因此最初在設計的時候就決定不採用場景復原或物件再脈絡化的展示(contextual display)，而是採用再現「想像的空間(imagined room)」並搭配重新編寫的腳本，透過「詩意」的方式來重現娼妓的生活與心境，以增加其戲劇效果。在此展區，可見佈滿蕾絲的華麗牆面以及幾個小小的窗口，其中展示了五個文物(梳洗盆、算盤、應徵照片、酒瓶與信件)(圖 9)，搭配語

音導覽瞭解該展區描述的是一位日籍女子來到新加坡卻淪為娼妓的情感故事。梳洗盆代表著女孩與一位日籍客戶的初次相遇、算盤代表著妓女被「去人格化」做為商品的事實、照片述說著與願景差異極大現實（應徵妓女工作的照片，同時也是寄信回家報平安的照片）、酒瓶代表女孩與其日籍客戶的情感昇華、而書信則代表情感的依歸因其身份而悲劇收場（日籍男子書寫無法迎娶她的總總原因）。在此展區，觀眾只能在黑暗的空間中往展櫃的幾個小窗口中望去，模擬「窺探」的視角與心態，恰如其分地仿造女性被化為「被觀看的客體」，滿足世俗之人對於娼妓生活不可直言的好奇。透過娼妓的故事，國家館再現早期女性移工悲情的身影，並突破傳統展示中歷史人物的客觀化與去肉身化(disembodied)的問題，強調早期移民的黑暗過去；然而，僅再現日籍娼妓的心聲，為其試圖突破當今對於該職業的言論禁忌與歷史人物的去肉身化打了折扣。早期移民的慾望流動被限縮在新加坡四大族群以外的社群（連上門的客人都是日籍人士），反應博物館仍試圖切割、忽略娼妓一行業存在於四大族群之間的歷史事實¹⁷。



圖 8 娼妓展區
(攝影／張釋)



圖 9 娼妓展區的小窗戶
(攝影／張釋)

由上述兩女性勞動職業再現之分析可知，首先，博物館嘗試平衡過去歷史中以男性為主體的論述觀點，讓女性的身影出現在展廳之中；然而，女性卻被放入「個人經歷路線」，在「國家史蹟路線」依然處於缺席的狀態，顯

¹⁷ 新加坡的娼妓，主要是廣府籍與潮州籍娼女... 19 世紀 70 年代的妓院，多集中在香港街、福建街、新橋路、珍珠街及北干拿路等區，即今大坡牛車水區及臨近街道（崔貴強，1994：118-9）。

示女性的故事被視為小歷史。其次，館方試圖呈現殖民社會黑暗面，卻僅用日本娼妓作為代表，以無法順利脫離妓業，使得情感依歸悲劇收場為主題；未提及新客與婦女受拐騙、逼良為娼的現象，以及背後華人移民如「豬仔」般被販賣的議題。最後，女性雖以勞工的身份出現，其故事仍與「家庭」有關：妓院與娼妓在這樣的社會環境，為無法重新建立熟習、穩固的家庭紐帶之勞動男性提供了替代性的方案，使用另類的形式來慰藉「孤寂」，去買一個「家庭」的想像與假象；而媽姐透過梳起儀式以示終生不嫁，挑戰盲婚啞嫁的傳統，選擇由姐妹組成的新型家庭。國家館賦予女性「主動者」的角色，展現女性移工在命運與自由意志交織下堅定的生命故事，然而，整個論述的背後卻依然在「家庭」的軸線上位移，其他的女性勞動者，如更象徵女性能在男性為主的勞動體系中走出一條路的紅頭巾¹⁸，在展覽中則是缺席的。

結論

經觀察與分析發現，館方嘗試讓觀眾透過不同的動線與脈絡拼湊歷史事件的多元詮釋觀點，並賦予底層與個人發聲的機會，然該「多聲體驗」的設計卻共同編織、支撐著一個「單一敘事」，以「延續新加坡認同價值」。如展示雖賦予了女性勞工發聲的機會，然女性多出現在「個人經歷」路線上，脫離不了家庭與情感依歸，身影始終符合「以男性為主體」的社會所賦予的角色；展示設置也強化了家庭對穩固社會的重要性。又如，展示中可看見館方透過肯定勞動、強調家庭、勤奮奉獻與重視團結等來塑造移工形象，符合李光耀前總理大力推動的社會秩序：融合亞洲價值與東方精神能帶來國家與社會的繁榮，彌補西方社會欠缺秩序和穩定的問題(Tamney, 1996)。最後，展覽透過特殊的展示技術與手法，製造了「混亂的過去與秩序的現在」之印象，宣告著動亂的時代已過，當今則是日益強盛、人人生活富裕的時代。如國家

¹⁸ 紅頭巾又稱三水婦女，在二十世紀中期因環境、家庭等因素，離鄉背井來到南洋。在新加坡，他們在建築工地從事粗重的工作，為當時鮮明的社群與行業。取自新加坡文獻館網站：<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261>（瀏覽日期：2014.9.29）。

館中〔導覽 30-Poor Lives〕訴說貧富差距的所產生的社會問題，以及〔導覽 35-人力車夫〕提及勞動階層面對的險惡的生活環境與疾病問題，無形中讓觀眾自行投射出昔今的對比。誠如李顯龍總理於2014年國慶大會之演說：

幸好，建國的那一代新加坡人，確實是剛強勇猛、吃得苦中苦的人上人。而且，他們還懂得顧全大局，犧牲小我。他們日夜勞作，不知道什麼是生活和工作平衡。他們往往必須靠一份非常微薄的薪水養活一家大小。為了培養下一代，他們吃盡了苦頭……我們應該在先輩們建立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絕對不能安於現狀，停滯不前。

除了以先民之貧苦，反映後輩之幸福，博物館正透過展示早期華人移民的困境與苦難，將之與日後經濟危機的衝擊與自然災難的重創，串聯成一個具有交錯重疊處的歷史，試圖改變人們與過去的關係，將「他者（移民）的歷史」轉變成「我群的認同」、引發超越族群的國家情感。而展覽中的移動意象除了是國家對於自身在全球化時代的定位之確認，更暗喻了政府對於國家與邊界的想像與方向。

全球化帶來最顯著的改變之一，便是世界以驚人的速度開始在萎縮 (shrinking)；世界正在進行前所未有的縮小，也正重新描繪和跨越傳統邊界的界限 (Tam et al., 2002)。新加坡在經濟發展與建設達到水平之後，努力以國家為主體去形構各種符合國家精神的形象與價值的想像社群。而由於「歸屬感與團結感在多元異質的社會中不會自然而然地發生」(Wah, 1992; Ortmann, 2009: 31)，國家必須要更積極、主動地形塑國家的認同。我們可以看見，新加坡以共同受殖民的經驗為基礎，透過國家符號的串連，去建立新的族群意象、新的我群；然而，從十九世紀處於邊緣的「非典範社群」，立身成為多元族群與文化的移民國流動、混雜、多元的「典範觀點」¹⁹的過程中，必須

¹⁹ 王明珂於《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一書 (pp. 422-423) 中提出「典範觀點」與「邊緣觀點」的理論；前者指的是社會上有權或核心族群所記錄和詮釋的歷史觀點，後者指的是邊緣社

面對的第一個課題為：族群間的差異性、各族群內部的多元性以及對於歷史解釋的缺乏共同性。

本研究認為若博物館能將「移民人性化(humanization of migration)」(Schorch, 2014: 1)，而非停留在其職業、性別與族群，可為處理移民與移動之歷史與議題開啓另一個視角。Schorch (ibid.)的研究以澳洲墨爾本的移民博物館(Immigration Museum in Melbourne)為例指出，該館使用互動裝置—訪問台(interview booth)—讓觀眾能透過選取問題、聽取〔研究員事先做好的〕訪談片段，了解每一位移民(受訪人)的個人故事與移民經歷，包含思鄉之苦、來到新國家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以及將澳洲視為家園的過程等等，讓觀眾反思國家、移民與自身的連結，並意識到國家(澳洲)正是由你、我、他這些來自他鄉的人共同編織而成的新記憶，為博物館連結移民史與國家史的連結提出新的觀點與做法。

參考文獻

- 文平強，2007。馬來西亞華裔人口與方言群分布，華研通訊，1：27-35。
- 王明珂，1997。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語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
- 王賡武，2005。移民的興起與中國。臺北：八方文化創意室。
- 丘婉鳴，2005。新加坡牛車水文化分析。新加坡：水月企業。
- 李威宜，1999。新加坡華人游移變異的我群觀：語群、國家社群與族群。台北：唐山。
- 吳莉君譯，Berger, John 著，2010。觀看的方式。臺北：麥田。
- 崔貴強，1994。新加坡華人——從開埠到建國。新加坡：新加坡宗鄉聯合總會、教育出版私營有限公司。
- 麥留芳，1985。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蕭新煌、張維安、范振乾、林開忠、李美賢、張翰璧，2005。東南亞的客家會館：歷史與功能的探討，亞太研究論壇，28：185-219。
- Aronsson, P. 2011. Explaining National Museums. In: S. Knell, P. Aronsson, A. Bugge Amundsen, A. Barnes, S. Burch, J. Carter, V. Gosselin, S. Hughes, and A. Kirwan (Eds.), National Museums: New Stud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pp. 29-54. Abingdon: Routledge.
- Barth, F., 1969. Introduction. In: F.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al Cultural Differences. Long Grove: Waveland Inc.
- Chan, L. K., 2009. Envisioning Chinese Identity and Managing Multiracialism in Singapore,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eties of Design Research Conference, Seoul, 18-22 October 2009.
- Carnoy, M., 1984. The State of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havez, L. R., 2001. Covering Immigration: Popular Images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ua, Beng Huat, 2003. Multiculturalism in Singapore: an instrument of social control. Race & Class, 44(3): 58-77.

- Chua, Beng Huat, 2009. Being Chinese under official multiculturalism in Singapore. *Asian Ethnicity*, 10(3): 239-250.
- Dahlman, C., 2002. Reviews: covering immigration: popular images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nation by L. R. Chavez.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 499-504.
- Davies, K., 1996. Cleaning up the coal-face and doing out the kitchen: the interpretation of workers in wales. In: G. Kavanagh (Ed.), *Making Histories in Museums*.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 Dean, David, 1996. *Museum Exhibi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 Dobbs, Stephen, 2003. *The Singapore River: A Social History 1819-2002*.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Furnivall, J.S., 1948. *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urma and Netherlands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ost, Mark R., 2009. The making of the Singapore History Gallery: some personal reflections. In: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Past in the Present: Histories in the Making*. Singapore: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 Hill, M. & Lian, K.F., 1995. *The Politics of Nation 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in Singapore*. London: Routledge.
- Kavanagh, Gaynor, 2000. *Dream Spaces*.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 Knell, S., 2011. National Museums and the National Imagination. In S. Knell, P. Aronsson, A. Bugge Amundsen, A. Barnes, S. Burch, J. Carter, V. Gosselin, S. Hughes, and A. Kirwan (Eds.), *National Museums: New Stud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pp.3-28. Abingdon: Routledge
- Madern, Joanne, 2004. The 'isle of home' is always on your mind- Subjectivity and space at the Ellis Island Immigration Museum. In: Tim Coles & Dallen J. Timothy (Eds.), *Tourism, Diasporas and Space*. London: Routledge.
- McGregor, K., 2004. Museum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olonial to post-colonial institutions in Indonesia: a case study of the Indonesian National Museum, formerly the Batavia Museum. In: *The Horniman Museum, Performing Objects: Museums, Material Culture and Performance in Southeast Asia*, pp.15-30.
- Noiriel, Gérard, 2007. The historian in the cité: how to reconcile history and memory of immigration. *Museum International*, 59(1/2): 13-17.

- Ortmann, S., 2009. Singapore: the politics of inventing national identity.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8(4): 23-46.
- Porter, G., 1991. How are women represented in British History Museums? *Museum International*, 43: 159-162.
- Rocha, Zarine L., 2011. Multiplicity within singularity: racial categorization and recognizing 'mixed race'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30(3): 95-131.
- Said, E.W., 2000.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Literary and Cultural Essays*. London: Grant Books.
- Schorch, P., 2014. The cosmohermeneutics of migration encounters at the Immigration Museum, Melbourne. *Museum Worlds: Advances in Research*, 2: 81-98.
- Siddique, S., 1989. Singaporean Identity. In: K.S. Sandhu & P. Wheatley (Eds.), *Management of Success: The Moulding of Modern Singapore*, pp. 563-577.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Smith, B.C., 1994. A case study of applied feminist theories. In: J. R. Glazer & A. Artemis (Eds.), *Gender Perspectives: Essays on Women in Museums*, pp.137-146.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 Smith, L.; P. Shackel; G. Campbell, 2011. Introduction: class still matters. In: L. Smith, P.A. Shackel, G. Campbell. (Eds.), *Heritage, Labour and the Working Classes*. New York: Routledge.
- Sutherland, Claire, 2014. Leaving and longing: migration museums as nation-building sites. *Museum and Society*, 12(1): 118-131.
- Szekeres, Viv, 2007. Representing diversity and challenging racism: the Migration Museum. In: S. Watson (Ed.), *Museums and Their Communities*. New York: Routledge.
- Tamney, Joseph B., 1996. *The Struggle Over Singapore's Soul: Western Modernization and Asian Culture*. Berlin: de Gruyter.
- Tam, K.; W. Dissanayake; T. Yip, 2002. *Sights of Contestation: Localism, Globalism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Topley, M., 1959. Immigrant Chinese female servants and their hostels in Singapore. *Man*, 59: 213-215.

- Trocki, Carl A., 2002. Opium and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apitalism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33(2): 297-314.
- Wah, Elena Lui Hah, 1992. K2 Children's Learn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Singapor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12(2): 59-63.
- Warren, James F., 2003. Rickshaw Coolie: A People's History of Singapore, 1880-1940.
Singapore: NUS Press.

